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MICHAEL MCFAUL

[美] 迈克尔·麦克福尔 著

唐贤兴 庄辉 郑飞 译 唐贤兴 余亚梅 校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MICHAEL MCFAUL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美] 迈克尔·麦克福尔 著

唐贤兴 庄辉 郑飞 译 唐贤兴 余亚梅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美)麦克福尔(Mcfaul, M.)著;唐贤兴,庄辉,郑飞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SBN 978-7-208-12206-2

I. ①俄… II. ①麦… ②唐… ③庄… ④郑… III.
①政治制度-变迁-研究-俄罗斯-现代 IV. ①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4809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 著

唐贤兴 庄辉 郑飞译

唐贤兴 余亚梅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6.5 插页 4 字数 386,000

2014年4月第2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206-2/D·2475

定价 58.00 元

译者序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A. McFaul, 1963—)教授最重要的代表作。作为当今美国学术界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中生代代表,麦克福尔对当今俄罗斯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其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其对俄罗斯转型的理论建构以及相应的对转型理论的贡献,都是值得称道的。

麦克福尔于1963年10月1日出生于美国的格拉斯哥。早年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和斯拉夫语言,并在该校获得俄罗斯与东欧研究领域的硕士学位(1986)。1991年,他以《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与大国的干涉:一个关于国际背景下的革命理论》的博士论文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国际关系博士学位。¹通晓俄语、波兰语和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的他,于2001年被聘为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2004年晋升为教授。

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麦克福尔在其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里,都始终是一个积极分子。早在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1988—1990年,麦克福尔就担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并在两年后成为该中心的副研究员。在1990—1991年,他作为访问研究人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国际问题研究。1994年以来,麦克福尔担任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人员。自1995年以来,他还一直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研究员。

作为一个国际关系领域的专业研究者,麦克福尔的研究兴趣主要是

俄罗斯问题,尤其是俄罗斯转型研究。早在1990年至1991年,麦克福尔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做了两年的访问研究。其实,他对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兴趣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产生了。在其本科学习期间(1983年),他就前往当时苏联的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进行访问学习;两年后,他再度前往设在莫斯科的普希金研究所(Pushkin Institute)访问学习。这些相关的经历和训练为他日后研究俄罗斯问题打下了坚实的语言上、切身体验上以及人脉关系上的基础。1994—1995年,麦克福尔被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派往俄罗斯,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工作了两年。1998—2001年,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俄罗斯国内政治项目的主任。

麦克福尔在当今学术界俄罗斯问题研究领域有着颇高的知名度。这首先是因为其数量惊人的研究成果。他个人的专著,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著作、主编的著作多达近二十部,除了《俄罗斯未竟的革命》(2001年)这部最重要的代表作之外,《后共产主义政治:俄罗斯与东欧的民主前景》(1993)、《磨难中诞生的俄罗斯民主》(1993)、《俄罗斯1996年的总统选举:极化政治的终结》(1997)、《权力与目的:冷战后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2003)、《大众选择与被组织的民主:1999和2000年的俄罗斯选举》(2003)、《在独裁与民主之间: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政治改革》(2004)、《共产主义垮台之后:转型教训的比较研究》(2004)等都具有很高的引用率。至于发表在各种专业期刊上的研究论文,到目前为止更是达到了二百多篇。

当然,“著作等身”并不是他赢取学术界知名度的唯一因素。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来说,麦克福尔对转型理论的研究和贡献才是最为重要的。在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系,麦克福尔主要为学生们讲授转型理论和制度变迁,包括新民主国家的制度变迁、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等课程。在我上述提及的这些研究著作中,其中心的主题就是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俄罗斯未竟的革命》是对这一主题的集中阐述,也是他对其过去十多年里发表的有关转型的研究论文所提出的观点进行的系统整理。

麦克福尔对俄罗斯以及其他“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国家转型

的研究,其内容、方法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这些方面。首先,他用一套“革命的”理论来建构他的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分析框架。“革命”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里,革命意味着进步。但在西方学者的分析框架里,“革命”的话语虽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比如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此后相应的制度转型看做是一种“革命性的过渡”,就像本书作者所坚持的那样),但是,这个概念以及相应的理论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指代那些任何社会发生的重大制度变迁。在这一点上,所谓的“革命性过渡理论”是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后社会主义”研究范式相吻合和耦合的,甚至可以直接说,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革命性过渡”也好,“后社会主义”也罢,它们既可以指这些重大的制度变迁以抛弃和否定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比如原苏联东欧集团国家的转型),也可以指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来实现对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从而实现制度的重大变迁(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麦克福尔在本书中对俄罗斯的“革命性”转型很少具有价值上的评判,而更多地侧重于对事实的描述和分析,试图来揭示特定社会和国家发生的制度变迁的特定逻辑。其实,麦克福尔的这套分析范式,在其早期的研究文献中就有了较为娴熟的运用。他曾用有关的革命理论来分析苏联的外交政策和苏联解体后发生在这个地缘政治空间里的新国家的转型。²

其次,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至今仍十分流行的制度分析及其制度变迁理论,是麦克福尔分析俄罗斯政治转型的主要分析工具。在形成这本著作之前,麦克福尔在其众多关于俄罗斯国内政治转型的研究文献中,已经把经济学家的分析工具运用到了转型理论中来。比如,在研究俄罗斯的私有化问题时,麦克福尔认为国家权力和能力的特定状况对制度变迁产生了内在的规定性。³显然,这一理论观点直接受到了道格拉斯·诺斯的影响。同样的影响还体现在他对“路径依赖”的理解和运用上。本书以及他于1999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⁴,认为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根源于俄罗斯转型中特定的路径依赖。当然,麦克福尔对俄罗斯政治转型的理解和分析,并不是简单地运用经济学家的制度分析的概念和观点。相反,他熟练地运用了政治学

和其他社会科学所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和范式来弥补制度分析可能存在的不足。比如,以角色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就是这样。在制度分析者那里,制度的功能,比如制度对行为体的规范和塑造,被置于分析的中心和焦点。但是,制度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各种行为体在制度的起源中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很多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忽视了这一方面。麦克福尔通过对苏联历史的考察,尤其是对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失误的改革,以及叶利钦时期艰难曲折的制度变迁的系统分析,认为个人的角色比结构理论更具有解释力,尽管我们不一定要得出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结论来。选择这样的视角,直接影响了作者的分析技术和对资料的取舍。在数年时间里,作者数十次地往来俄罗斯,对苏联和后苏联的各种政治行为体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访谈对象从高层的领导人到专家学者再到底层的民众,访谈数量成百上千,从而比较系统地采集到了各行为体的偏好及其在变迁中的角色这些重要的分析样本。通过对个人角色和制度结构的有机结合,麦克福尔把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的路径、图式和“全貌”给读者揭示了出来。可以说,在以整个俄罗斯的转型为具体的案例来进行深度的和系统的制度分析方面,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超越本书的其他类似著作。

第三,在经过对俄罗斯的政治转型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后,作者得出的很多关于转型理论的有意思的结论性观点,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于理解其他转型社会的知识。本书作者通篇论述的是,到底哪些因素制约着俄罗斯的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拖拖拉拉的转型过程?行为体的偏好,转型议程的设置,对权力平衡的理解和实现权力平衡上的斗争,政治游戏规则制定及其相应的技术性因素,等等,都成为作者考察的中心。从比较政治(包括比较公共行政,比较政策过程等)的角度来认识,作者在本书中得出的诸多观点在较大的范围里具有较大的适用性。比如,对于一个转型中的社会来说,涉及制度变迁的议程设置上,各行为体对变迁议程的争议范围越大,就越不能期望有一个顺畅的转型。所以,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俄罗斯政治中两极化现象的逐渐消失,对于转型是有积极意义的。再比如,制度设计的时机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和机会等因素都是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这一点,在政党的产生、民主的

巩固和选举之间的关联上表现得尤为明显。⁵

我是2002年在美国佐治亚大学卡尔·文森政府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发现这本书的。作为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同行,尽管我与她素未谋面,但我还是给麦克福尔打了电话和发了电子邮件,表达了我希望翻译该书的愿望。麦克福尔欣然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许诺他会出面与康奈尔大学出版社洽谈版权事宜。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十分热情地表示愿意出版该书的中文版。于是,我回国后就组织力量对该书进行了翻译。然而,翻译和出版的进程是那樣的曲折,几乎与俄罗斯本身的转型一样充满着各种变数。首先是因为2003年我的工作性质和研究方向有了很大的变动,我的主要精力不再集中于国际关系理论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和教学上,而是转到了国内公共政策的研究上来了。其次是因为我女儿唐寓清的出生和对她的养育人花去了我很多的时间,使得我的翻译工作只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要不是范蔚文先生持续不断的鼓励和催促,要不是复旦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慷慨支持,这本译著的出版将几乎走入夭折的地步。麦克福尔本人曾说,写作和出版该书花了他十年的时间。现在看来,我们翻译出版该书也花了近七年的时间。可谓好事多磨。

在此,我必须要向范蔚文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编辑和出版领域,像他那样对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以及对国际问题研究的支持保持着持久的热情,确实是不多见的。同时,我要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桑玉成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的肖卫民和左昌柱先生、复旦大学出版资助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周桂发先生,因为他们在本书获得出版资助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杨心宇教授和唐朱昌教授——我在复旦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的两位同事和师长——认真地阅读和评价了本书的翻译稿,没有他们的鼎力推荐,就不能想象本书能获得出版资助。我的同事和好友刘军梅博士,这个我国国内俄罗斯问题研究界为数不多的精通俄语的青年学者,不厌其烦地帮我翻译和校对书中众多以英文形式出现的俄文单词。总之,再好的语言也不足以表达对上述这些人士的感谢之情。

本书的英文版本的作者所使用的政治学专业语言是很拗口甚至颇为晦涩的,在翻译和校对过程中极为艰辛。但在对全书的审阅过程中,张笑

天编辑非常认真细致又很专业地指出了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本书翻译的分工如下;庄辉翻译了第五、六、七章;郑飞博士翻译了第八、九、十三章;全书其余的章节以及序言、致谢等内容,都由我本人翻译。我的妻子余亚梅女士对全书的翻译稿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逐字逐句的校译,最后由我完成第二轮的逐句校对。

唐贤兴

2009年10月

注 释

1. Michael McFaul, "Southern African Liberation and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1991.

2. 除了他的博士论文之外,其代表性的文献还可分别参见:Michael McFaul, "The Demise of World Revolutionary Process: Soviet-Angolan Relations Under Gorbachev,"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6, no. 3, (March 1990): 165—189. Michael McFaul, "Russian Centrism and Revolutionary Transitions," *Post-Soviet Affairs*, vol. 9, no. 4, (July-September 1993): 196—222.

3. Michael McFaul, "State Pow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World Politics*, vol. 47, no. 2, (January 1995).

4. Michael McFaul, "Institutional Design, Uncertainty, and Path Dependency during Transitions: Cases from Russia,"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 no. 1, (March 1999): 27—52.

5. 麦克福尔曾说:"在民主巩固的过程中,没有哪种政治因素比定期的、连续的选举来得更重要。"Michael McFaul, *Post-Communist Politics: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3), p. 88.

序 言

1988年春,为了我的专题论文《南部非洲的革命》,我去了莫斯科做一些最后的访谈。由于我对革命过程的国际影响尤其感兴趣,因此当时我想结识一些研究同样主题的苏联学者。那个春天我对非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的访问几乎没有成功。伪装成高级研究员的克格勃分子在安哥拉、津巴布韦或南非等地从事一些煽动革命的秘密活动。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也像他们一样是为同种性质的机构工作的,他们对我的动机非常警惕。该研究所的坦尼亚·克拉斯诺彼夫索娃(Tanya Krasnopevtsova),一个真正的学者,对我的研究非常感兴趣。我们避开研究所这个有麻烦的地方,来到一个安全的东正教高级主教的公园里,坐在池塘边的长凳上。坦尼亚·克拉斯诺彼夫索娃告诉我苏联在南部非洲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当她终于得知我的论文是关于革命的时候,她嘲笑我对案例的选择:“革命就在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国家里进行着,你为什么要去研究安哥拉?”

那年春天我与坦尼亚·克拉斯诺彼夫索娃的意外相遇对我的研究兴趣产生了巨大影响。她把我介绍给两个不修边幅、疯子般的、浪漫主义的革命活动家——尤里·斯库布科(Yuri Skubko)和维克多·库申(Viktor Kuzin)。那时候,他们俩正忙于组建苏联第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党——民主联盟(the Democratic Union)。这个政党的指导原则是消除列宁崇拜和产生多党制民主。如果说这不是十足天真的幻想,在当时也是非常激进的想法。当时,我并不认为这些民主联盟的活动家会有任何成功的机

会,但我对他们的毅力产生了兴趣,对他们的特殊使命表示同情。在很多方面,他们使我想起那时流亡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的朋友们。虽然他们信奉的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一个组织提倡共产主义,另一个组织信奉资本主义,但是,无论是“非国大”的流放者,还是民主联盟的创建者,他们都表现出了以自由的名义挑战强大政权的勇气,即便这种挑战对他们的个人幸福而言是一种巨大的风险。1988年我在访问过程中,经常看到一小队黑色伏尔加车(那是克格勃选择的车辆)停泊在民主联盟活动分子的公寓门口。这分明表示,在苏联争取自由的斗争可能就像南非人为自由而战一样是一场持久战。

受到这些革命活动家的勇气的感染,我重新确定了我个人生活和学术生涯的方向。经过1988年、1989年和1990年几次较为短暂的访问,我终于获得了“国际研究交流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s Board, IREX)1990—1991年度的研究员职位,从而得以在莫斯科从事研究。我在申请中说我将研究苏联对非洲的态度问题,但令我在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学术指导非常失望的是,我对这个主题只做了几个星期的研究。(我感谢IREX的全体工作人员,尤其是利兹·麦科恩(Liz Mckeon)为我新的兴趣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到1990年秋天,形势已经很清楚,苏联特别是俄罗斯正处于社会革命的中途,这次革命的规模堪与现代史上其他几次革命相媲美。如同我现在依然相信的那样,那时的我认识到这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将成为20世纪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同时我也认识到,我已经得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

那一年,我遇到了很多对本书起着最重要作用的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有机会同许多这些真实历史的创造者进行联系、面谈和畅饮,当时,他们所进行的革命已经开展了。1990年秋天,我下定决心有朝一日将写出一本关于这些事件的著作。我住在莫斯科期间,正值每周一次发生街头示威的大混乱、军队进入波罗的海三国、法西斯主义分子死灰复燃,以及新共产主义复兴之际。我意识到这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将在较远的未来继续存在。因此,我没有立即动笔撰写本书,而是与谢尔盖·马可夫(Sergei Markov)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对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的访

谈。那本《动乱中诞生的俄罗斯民主》* (*Troubled Birth of Russia Democracy*)打算为未来研究这次革命的学者(包括我自己)提供原始资料。要对新俄罗斯革命有一个更综合性的、分析性的解释,只有等到我们对革命将在何时以及如何结束有一个较好的理解时才有可能。

十年后,我依然在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束点。因为工作的更换、结婚、做父亲,以及其他出书计划的原因,本书的出版一拖再拖,被推迟了十年之久。当然,本书出版被耽搁的最决定性原因,是俄罗斯革命秩序持续的不确定性。要写出一本关于俄罗斯从共产主义统治过渡到民主的书,我需要知道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已经过渡到什么地方了。在苏联解体后十年的今天,要知道这一点似乎依然为时过早。

当然,所有的重大社会革命的开展都要超过数十年,而不是短短的数月或几年时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后十年,美利坚合众国依然没有一部宪法。1799年,法兰西依然处于革命的混乱状态之中。1927年,苏联依然在做市场方法的试验,而斯大林并未完全控制住局势。甚至在这些革命都已经结束了数十年之后,在革命劫荡中形成的规则和制度也解体了。而且那些在当时目睹这些重大瞬间的观察家们,也绝不是善于预见这些革命的最终后果的。今天,政治科学家并没有为我们在急速变迁时期增强预言能力提供多少帮助。因此,本书以一个谨慎的注释结束,充分意识到俄罗斯第二次革命的许多章节还需要展开。

然而,很多东西已然存在,其中一些轨迹是清楚的,而且,人们也可以看到在后苏联的俄罗斯有可能改变政权巩固方向的那些因素。这些构成了本书的目标。本书并不能穷尽最近15年来在苏联及而后的俄罗斯所发生的所有领域的所有变化,而是紧紧扣住革命性变化的一个方面——政治体系的变化,以此来分析其他的转型(transformation)。在当代本土政治科学中,政权变更被看作是因变量,其他变迁比如领土变更或经济改革则被描述成自变量。

我的立论是由自变量和因变量所构成的,而且受到了有关民主化、制度变迁的学术文献中的理论争论的启发和影响,在较小程度上,也受到了

* 该书由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于1993年出版。——校译者注

关于革命的学术争论的影响。我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检讨那些他人考察不同案例而建构起来的理论，而在于以比较的视野分析一个重要的案例，从而实际地发展出一种新理论。不过，对理论论争不感兴趣的人，或对神秘的政治科学理论不熟悉的人，也不必感到惊慌。虽然本书每一章的谋篇布局和分析研究都贯穿着理论论争，但是，我还是有意努力保持生动的历史，避免使用学术行话，这在本书主要的历史章节中尤其如此。冒着让每一个人都失望的风险，我之所以决定写一本同时要讲到一段重要历史的理论著作，是因为我相信，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健康的紧张关系。

最后，本书也许并非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是一本提供文件证据的著作。在最近十来年的经历中，我访问了成百上千的俄罗斯政治家和政客。数年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数次让我分享他们的思想。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注释中只出现了一小部分的访谈内容。我在访谈中所得的每一个事实，都尽力找到文字上的出处。然而，也同样由于篇幅的限制，很多难以找到的引证，连同几乎所有的起初对我的研究产生启发的二手文献，都被省略掉了。Archie Brown, John Dunlop, Steven Fish, Jerry Hough, Nikolai Petrov, Tom Reimington 和 Steve Smith, 以及 Michael Urban 的工作对本书的问世尤为重要。对于对这一时期特别感兴趣的学者而言，大部分的访谈录音，以及本书更长的描述及从中引用的文件证据，最终可以从胡佛研究所的档案室中找到。

致 谢

十年磨一书的，实在亏欠了太多。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系、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以及胡佛研究所一直支持着我的研究和写作。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聘请我作为其在莫斯科的现场代表，这使我得以保持同许多主要信息来源者之间的联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为我1994年至1995年间在莫斯科的另一个家，并自此一直支持我的研究工作。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对本书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这些机构的支持中，我要特别感谢卡内基基金会的默特·阿布拉默茨(Mort Abramowitz)，保罗·白乐然(Paul Balaran)，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阿诺德·霍勒里克(Arnold Horelick)，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Mathews)和史蒂芬·希斯坦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胡佛研究所的约翰·雷欣(John Raisian)和查尔斯·帕姆(Charles Palm)；以及哈佛大学的切普·布莱克(Chip Blacker)，戴维·霍洛维(David Holloway)，斯科特·萨根(Scott Sagan)和巴里·温格斯特(Barry Weingast)。来自纽约卡内基基金会、摩特基金会(Mott Foundation)、全国欧亚和东欧研究会(National Council for Eurasian and East European Research)、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斯达基金会(Starr Foundation)的资助支持着我近年来在多个领域内的研究。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纽约卡内基基金会，多年来，在不同地方的多个课题研究过程中，它一直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花费极大精力和时间阅读书稿的学者们。我真心感激这一阅读并评论他人著作的慷慨行为;尤其感谢那些花费了大量时间来阅读比这本书长得多的原稿的学者们,除了在未来通过阅读你们的书稿来偿还之外,我无以为报。我还要特别感谢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Åslund),弗拉基米尔·波克瑟(Vladimir Bokser),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林恩·伊登(Lynn Eden),吉姆·费伦(Jim Fearon),吉姆·戈德杰(Jim Goldgeier),戈登·哈恩(Gordon Hahn),戴维·霍洛维(David Holloway),安德鲁·古晋(Andrew Kuchins);盖尔·拉比杜斯(Gail Lapidus),戴维·莱廷(David Laitin),莎拉·门德尔松(Sarah Mendelson),尼古拉·彼得罗夫(Nikolai Petrov),斯科特·萨根,史蒂芬·施德曼(Stephen Stedman),丽莎·麦金托什-桑德斯特伦(Lisa McIntosh-Sundstrom),史蒂芬·索尔尼克(Stephen Solnick),凯斯琳·斯通纳-韦斯(Kathryn Stoner-Weiss)和巴里·温格斯特,他们的批评和支持都给我极大的帮助。此外,还要特别感谢乔治·布莱斯洛尔(George Breslauer),瓦莱里·邦斯(Valerie Bunce),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马修·伊万杰里斯塔(Mathhthew Evangelista),托马斯·雷明顿(Thomas Remington)和斯维特拉纳·恰里科(Svetlana Tsalik)的辛勤劳动。他们的工作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职责:不仅阅读了每个段落,有时甚至还不止一次。伊丽莎白·伯恩斯坦(Elizabeth Bernstein)和伊丽莎白·伊克扎霍夫(Elizabeth Ekzarkhov)承担了许多编辑和研究助理的工作;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罗格·海顿(Roger Haydon)的督促促使我将一本生涩难懂的长篇小说稿转变成一本易读的专著。在这些年来,研究助理坦尼娅·科瓦连科(Tanya Kovalenko),埃利娜·特伊格(Elina Treyger),阿列克谢·迪科夫(Aleksei Titkov)和安德雷斯·尤姆兰(Andreas Umland),以及秘书图拉·帕潘尼古拉斯(Toula Papanicolas)和维拉·雅库莎(Vira Yakusha)的帮助也让我获益良多。

本书的观点形成于我同俄罗斯多名观察员同事的数次探讨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参与者又是分析家。我从弗拉基米尔·阿基莫夫(Vladimir Akimov),弗拉基米尔·波克瑟,珍妮·比斯特里斯基(Jeanne Bourgault),安德烈·比斯特里斯基(Andrei Bystritsky),列昂迪·彼佐夫

(Leonty Byzov), 詹姆斯·查文(James Chavin), 亚当·爱尔斯坦(Adam Elstein),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 阿纳托利·戈罗夫(Anatoly Golov), 列奥尼德·戈兹曼(Leonid Gozman), 瓦谢斯拉夫·伊格鲁诺夫(Vyacheslav Igrunov), 佛瑞德·海亚特(Fred Hiatt), 戴维·霍夫曼(David Hoffman), 阿列克谢·卡拉-穆萨(Aleksei Kara-Muza), 伊格尔·哈里乔夫(Igor Kharichev), 瓦莱里·霍米雅科夫(Valery Khomyakov), 坦尼娅·克拉斯诺彼夫索娃(Tanya Krasnopevtsova), 弗拉基米尔·库兹涅佐夫(Vladimir Kuznetsov), 玛莎·李普曼(Masha Lipman), 弗拉基米尔·李森科(Vladimir Lysenko), 亚历山大·米查尼克(Aleksandr Mechanik), 谢尔盖·马可夫, 弗拉基米尔·毛(Valdimir Mau), 鲍里斯·马卡连科(Boris Makarenko), 伊格尔·明徒斯耶夫(Igor Mintusev), 维克多·彼什科夫(Viktor Peshkov), 尼古拉·彼德洛夫(Nikolai Petrov), 安德烈·雷亚波夫(Andrei Ryabov), 阿兰·卢索(Alan Rousso), 玛格丽特·沙比诺(Margaret Shapiro), 维克多·谢尼斯(Viktor Sheinis), 莉莉亚·谢夫佐娃(Liliya Shevtsova), 米哈伊尔·施奈德(Mikhail Shneider), 斯蒂芬·塞斯坦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 艾琳·史蒂文森(Irene Stevenson), 叶卡捷琳娜·叶戈洛娃(Yekaterina Yegorova), 弗拉基米尔·佐里金(Vladimir Zharikin)和阿列克谢·祖丁(Aleksei Zudin)的不同视角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而,我最为感谢的,则是所有在俄罗斯帮助过我理解这一革命的人们。正如他们竭力创造历史一样,革命双方都尽其所能地帮助我记录下这一历史过程。有时,我必须开着录音机,在最高苏维埃投票的间隙同一名代表边走边采访。有时我会在周日凌晨两点同一些人见面,因为这是他们仅能找到的空闲时间。许多人都非常热情,邀请我去他们的公寓和别墅,并花费数小时同我分享他们的回忆和感想。一些信息提供者一直都是我的朋友;有些则在之后将我视为其事业的敌人。所有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会在我的历史描述中找到缺陷。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本书能促使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记录下他们的所见所闻。这一革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被继续研究;现在发掘出越多的资料,就对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越有利。

最后,我要对我的妻子唐娜·诺顿(Donna Norton)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即使在我忙于研究而无法抽身陪她的时候,她也依然理解这一革命对我的重大意义。20世纪90年代,我大约去过俄罗斯五十次,这也意味着我们五十次的分离。但这还不是全部。在1993年12月大选之后,当法西斯的恐怖似乎要威胁到俄罗斯的民主时,唐娜答应跟随我——不,她告诉我我们必须——去莫斯科。她放弃了她的工作和阳光明媚的帕洛阿尔托(Palo Alto)而移居莫斯科。在俄罗斯,她没有任何工作机会,只懂得一丁点儿俄语,而作为一个南加利福尼亚人,她对寒冷的天气有一种天生的厌恶。但她是一个能吃苦并很有毅力的人。她知道生命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不是。在1995年回到美国之后,本书继续萦绕着我们的生活。我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去完善本书而不是陪在她的身边。她的耐心、智慧和支持,我将永记于心。

迈克尔·麦克福尔

于华盛顿